

贬谪文学论集

蒋长栋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一个尚待开拓的文学研究领域

——代序

蒋长栋

全国首届、二届迁谪文学讨论会于1998年、1999年分别在湖南怀化市及衡阳市召开,与会专家和教授们向大会提供了数十篇有关这一课题的论文。受大会之托,本人在认真审核、筛选及局部删修的基础上,酌定以其中的近30篇结集而成书。我国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陕西师大霍松林教授欣然为此书题写书名,在霍老的建议下,原定书名《迁谪文学论集》改为《贬谪文学论集》,如此则更切合全书内容之实际。此《集》作为我省及全国古典文学研究家们的集体智慧之结晶,是足以令人欣喜和庆祝的,这是因为,此《集》中不仅的确不乏颇有见地和创意的高水平论文,而且所研究的“贬谪文学”之课题,乃是一个古人极少涉足、今人尚乏深入研究的有待开拓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因此,《集》中所收之论文,姑且无论其实际水平之高下优劣如何,仅就课题选择而言,在整体上就具有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存在,贬谪文学已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说,从屈原的《离骚》《九章》开始,就已经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贬谪文学”。古代文论家们囿于时代及文学观念等诸多因素的

局限而未能提出“贬谪文学”这一概念,乃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历然之必然。时至文学观念已经现代化、学科研究已经信息化的今日,我们已没有任何理由将贬谪文学再排除在研究日程之外了。

贬谪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漫长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下,只要是稍稍正直耿率的文人士子,差不多都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被贬谪的辛酸经历,而重视“立言”的文化传统,又使他们留下许多反映其被贬期间之特殊情感与心态的文学作品。若将这些作品汇集拢来,其数量之巨,必将超过按传统分类的边塞、山水、宫怨、咏物、行旅、送别等诸多种类的文学作品(当然这些分类可能有与“贬谪”类在外延上交叉甚至重合者),仅此即可见出贬谪文学在“量”上所占有的沉重份额。若进而从“质”上来加以鉴别,则贬谪文学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古代文人士子的仕进之路,或“穷”或“达”,而真正能在“质”上取得突出之文学成就者,唯“穷”一途。古人对此论述甚多,司马迁所谓“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报任安书》),杜甫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韩愈所谓“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世如今,无疑也”(《柳子厚墓志铭》),都告诉我们一个确定无疑的道理:仕途之穷达与文途之穷达恰好成反比关系。然而,也并非所有仕途之穷者都可成为文学之骄者,例如,那些无缘步入仕途之“穷”者与已步入仕途而遭贬谪之“穷”者,就有着很大的区别。相对而言,前者对朝政之黑暗、官场之险恶、仕途之坎坷等社会体验甚少,其以隐居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若清汤寡水泡制的淡茶而甚乏其味;而后者则多在黑暗朝政中经历过酸甜苦辣的磨难乃至出生入死的考验,不少被贬者还是时代政治浪

尖上的弄潮儿,以他们的切身体会和感受所写成的作品,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释放出改革者的豪气和正直者的悲壮,宛若浓郁醇烈的醇酒而余味无穷。正因为这样,贬谪文学无论在“达者文学”或“穷者文学”中,都具有独特的天然优势。难怪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名篇,如从屈原的《离骚》、《九章》,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到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白居易的《琵琶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无不出自贬谪者之手笔。因此,选择贬谪文学作为研究课题,不仅是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尚未认真开掘的巨矿,而且是找到了一个含金量甚高的富矿。

正因为贬谪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一个尚待开掘的巨矿和富矿,因而对贬谪文学的研究便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浩繁的工程。大而言之,它既包括以贬谪文学之理论构建为主的宏观研究,又包括以贬谪文学之具体作家、作品研究为主的微观研究。细而论之,宏观研究包括由贬谪文学之内涵与外延所决定的学科定义、研究对象和范畴的研究,以及贬谪文学自身之纵向演进的轨迹与规律,与其他各种文学的横向联系之范式与规律的研究,乃至贬谪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中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影响等一系列理论性问题的研究;微观研究中包括对贬谪文学之作家、作家群及其作品的研究,其中属贬谪文学的作品与非贬谪文学的作品之区分、鉴别及其相互联系和影响,是应特别注意的问题,研究角度的恰当把握是防止将贬谪文学研究变成一般性文学研究的关键。令人欣喜的是,《贬谪文学论集》一书无论在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方面,都已有了可观的进展。全书近30篇论文中,有近三分之一为贬谪文学之宏观理论研究的文章,所涉论题既有关于贬谪文学理论之整体框架者,也有关于贬谪文学理论之局部问题者,还有对某些问题进行论争鸣者,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研究者们非凡的学术勇气和大大的创新精神;其余三分之二为贬谪文学之微观研究的文章,多是对贬谪作家与作品的研究,所涉时代从先秦之屈原

直至晚明之汤显祖,所论角度大体不离从“贬谪”出发而进行多视角的考察和研究,与前三分一的宏观研究文章合起来,恰好起到相互支撑、互为表里的补充、配合作用。而这其中,对王昌龄集中进行研究的近十篇文章,又是微观研究中所解剖的一个“麻雀”,为深入进行贬谪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开了一很好的先例。这种统筹规划、点面结合、逐渐推进的集体研究方法,在湖南省古代文学学会内及两届全国迁谪文学研讨会上,已经获得了较大成功,并且将鼓舞我们去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功。

我们总算开了一个好头,但愿在新世纪里,我们将能在贬谪文学这块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垦出一块更大的天地,结出更多丰硕肥美的果实。

2000年12月31日

于湘潭大学北斗村

目 录

一个尚待开拓的文学研究领域——代序…………… 蒋长栋(1)
从执著到超越

——贬谪与贬谪文学论纲……………	尚永亮(1)
迁谪文学之我见……………	胡迎建(16)
迁谪中的怨诽与讽谕……………	谭德晶(24)
中国古代贬谪文化初探……………	孙适民(39)
迁谪文学探源……………	罗忠族(44)
“迁谪文学”异议……………	王德亚(46)
唐人迁谪诗漫议……………	陶 敏(50)
屈赋与迁谪文学漫议……………	张利珍(56)
迁谪文学与岳阳人文精神……………	汪立中(65)
王昌龄龙标之贬考论……………	蒋长栋(73)
王昌龄在常德的诗歌创作……………	梁顺成(84)
《湘学略》中何以缺王昌龄一席……………	伏家秀(92)
李白、王昌龄绝句异同论……………	葛景春(98)
王昌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赵祖英(107)
论王昌龄诗中的感伤情境……………	刘铁峰(113)
黔城芙蓉楼考……………	沈 群(121)
悲秋以托志 志深而怨幽	

——试论王昌龄《长信秋词》的本真寄托…………… 潘雁飞(124)

情浓意重 含蕴无穷

——读王昌龄《送魏二》、《卢溪别人》有感…… 邓人璋(133)

试论屈原的狂人精神与伟大人格…………… 杨仲义(135)

卢藏用考论…………… 周建军(149)

大名诗独步

——杜甫湖湘诗创作成就论略…………… 蒋长栋(155)

杜甫笔下的湖湘特色…………… 聂乐根(166)

镶嵌在儒文化模式和传统中的韩愈

——“韩愈现象”及其文化解读…………… 杨子怡(170)

寓意山水的个体忧怨和美学追求

——论柳宗元游记诗文的直接象征性和间接表现性

…………… 尚永亮(182)

海天愁思正茫茫

——试论柳宗元的悲剧人格…………… 李成文(196)

试论刘禹锡的不同社会角色对其《竹枝词》创作的影响

…………… 刘爱梅(202)

论苏轼迁谪期间的精神胜利法

——兼探封建士大夫文人的文化心态…………… 周云龙(207)

王庭珪贬窜泸溪史实钩沉…………… 萧东海(220)

王守仁谪龙场经常德的诗歌创作…………… 梁颂成(229)

天地孰为贵 乾坤只此生

——论汤显祖谪居徐闻所倡“贵生”说…………… 李鸿渊(241)

从执著到超越

——贬谪与贬谪文学论纲

尚永亮

中国贬谪文学的开端在屈原那里,而它的鼎盛期则在唐、宋两代;在这两代中,又突出表现在元和、元祐两大时期;在这两大时期众多的贬谪士人中,柳宗元、刘禹锡和苏轼、黄庭坚堪为典型代表,而白居易则可作为承唐启宋的过渡人物。从屈原到柳、刘,中经白氏而至苏、黄,标志着中国贬谪文学的三个重要阶段,也显示了贬谪士人的三个重要心理流程。如果将屈原赋中所展露的主要精神意向视作贬谪主题的一种基本模式,那么上述三个阶段的突出特点便应为模式的确立、模式的继承和模式的突破,亦即从执著走向超越。

1、贬谪与贬谪文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既高度囊括了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的本质特征,又深刻揭示了古代士人基于人生忧患的各种心理流程;在这些心理流程中,既集中体现了儒、道、佛诸家思想的消长转伏,又明确展露了人生的大欢乐和大悲哀、大真实和大虚幻。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古代士人在沉重苦难中从执著走向超越的生命运行轨迹。

2、宽泛地讲,贬谪是对负罪官吏的一种惩罚。《说文》:“贬,损也。”“谪,罚也。”在古代社会,大凡政有乖枉、怀奸挟情、贪黷乱法、

心怀不轨而又不够五刑之量刑标准者，皆在贬谪之列。所谓“减秩居官，前代通则，贬职在迁，往朝继轨”，正说明此一文化现象渊源有自。

由于谪官往往要被迁往远方穷僻之地，形同流放，所以古人又多将其事称为“流贬”。固然，在流与贬之间还有一定差别，如唐长庆四年四月刑部奏文即谓：“流贬量移，轻重相悬……流为减死，贬乃降资”，但实质上看，二者在“徙之远方，放使生活”一点上，却是大体一致的。所以孔颖达说：“据状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则太轻，致刑即太重。不忍依例刑杀，故完全其体，宥之远方，应刑不刑，是宽纵之也。”^③据此，我们广义地将流与贬作一整体看待。

追溯历史，早在尧舜时代，流贬即已滥觞。《尚书·虞书·舜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此后，负罪流贬者无代不有，与日俱增，甚而至于“此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④“至于上佐，悉是贬人”^⑤据《资治通鉴》，则天永昌元年，周兴诬奏魏玄同刺太后，魏被杀，“自余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贬者甚众”^⑥。玄宗开元元年，因穷治太平公主枝党，致使“百官素为公主所善及恶之者，或黜或陟，终岁不尽”^⑦。显而易见，历史上遭贬之人甚多，而其贬谪性质也很不相同。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很难缕述历史上的各种贬谪及其成因，但按性质却不外两大类。一类是坏人被贬，这是罪有应得的正向贬谪，如前述共工、欢兜，唐代酷吏权奸来俊臣、来子珣、王弘义、姚绍之、卢杞、柳璨等，宋代佞幸奸相珣德超、朱勔、蔡确、章、曾布、蔡京等，皆属此类情况；一类是好人被贬，这是不该贬、甚至该提升却被贬的负向贬谪，如战国时的屈原，汉代的贾谊，唐代的张说、张九龄、陆贽、阳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德裕等，宋代的王禹偁、寇准、范仲淹、钱颢、苏轼、黄庭坚、范纯仁、晁补之、张舜民、胡铨等，即属此类情况。

“刑本惩恶，今以胁贤”^⑧，“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

罪恒在直”^⑨。作为维护封建政治的工具,刑罚本是用以惩治不法之徒的,但结果却有大量正道直行、嫉恶如仇、直言敢谏、勇于革新的士人成了它的牺牲品。似乎可以认为,以屈原被贬为明确发轫的这一历史的根本变异,不仅使我们对封建时代的社会政治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也为我们考察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因而,这里讨论的贬谪,无疑主要指那种不应贬而贬的负向贬谪,这里论述的贬谪文学,亦即指此类人中有文学素养者在被贬之后的文学创作。

3、中国古代的负向贬谪大致可分四种类型:志大才高,因小人谗毁而被贬,屈原、贾谊可为代表;革除弊政,因斗争失败而被贬,柳宗元、刘禹锡可为代表;直言进谏,因触怒龙颜而被贬,阳城、韩愈等即是;党争激烈,因本派失利而被贬,其代表人物可推李德裕、苏轼。

表面看来,这四种类型的贬谪各有独自的成因,不容混淆,但从深层看,它们不仅错综交杂,彼此相关,而且在下面两点上,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第一,所有这些贬谪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在封建社会,君主是专制、法律的象征,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他们“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⑩所谓“雷霆之所出,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靡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万钧也”,^⑪便是对此情况的形象说明。尽管宰相、中书等制度也能对君权产生一定的制约力,但这种制约力往往是有限的;而当宰辅权柄为奸邪群小把持时,便更形成助纣为虐、残害忠良或欺上瞒下、挟私报怨的局面。当然,君主专制只是封建专制制度最突出的特征,在一般情况下,它仍是起终极作用的环节。历览古史,很多被贬者往往不经过此一环节而在其具体实施者的作用下即导致厄运,诸如汉代的外戚内竖,唐、明两代的宦官专权,以及历代屡见不鲜的佞幸奸相,便都是这一环节的具体实施者,是这一制度蔓生的毒瘤,

它们与君主专制汇合一涂，相互表里，共同构成了对中国古代士人的严酷压抑和摧残。

第二，这些贬谪无疑还源于广大士人强烈的参政意识及其对品节之持守。忧国忧民，积极参政，不甘以文人自居，而欲于政治风云中一展经纶，是中国古代士人的通识；而注重品格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更是中国士大夫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早在夏、商时代，即有关龙逢、比干等贤臣正道直谏，宁死不屈；东汉后期，亦有砥砺节行、横议时政，“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⑫的李膺、杜密、范滂等清流义士；此后的各朝各代，都涌现出大量“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⑬、“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⑭的志节之士。事实上，正是这些士人刚直不阿、狷介特立、不愿混世和俗、许国不复谋身的心性，导致了他们在专制君主的淫威下，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中难以立足、相继被贬被流的人生厄运。

可以说，上述两点虽截然相反，却紧相关联：没有严酷的以权代法的封建专制制度，史不绝书的负向贬谪事件就不会发生；没有广大士人强烈的参政意识及其对品节的持守，这些事件不仅同样难以发生，而且饱含悲剧精神的贬谪文学也将化为子虚乌有。

4、对中国古代士人来说，贬谪既意味着一种人格的蹂躏和自由的扼杀，又标志着一种最沉重的忧患和最高层次的生命体验。一方面，这些士人在被贬前大多是所处时代的杰出人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治国平天下乃是他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所谓“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⑮、“知不可而愈进兮，誓不偷以自好”^⑯，便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果于用事、踔厉风发的心性；但另一方面，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⑰的人生转折，是“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⑱的生命沉沦。如果说，这突发的生命两极变化曾经以其迅猛而巨大的落差给贬谪士人带来了剧烈的精神打击，使他们“辞高堂

而坠心，指绝国以摇恨”^{①⑨}，在仓惶促迫、吏役驱遣下，踏上了万里贬途，那么，贬谪地域的僻塞艰险和谪居生活的困苦久长便更给他们造成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磨难。

从贬谪地域看，自先秦直至唐宋，大都在南方瘴疠之地，元代“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②⑩}，而到了明清两代，则主要集中在西北塞外边疆。这些地域，无论是南是北，大都气候恶劣，条件艰苦，文化落后，路途遥远，被人视作畏途。唐人诗云：“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②⑪}；“一自轻放逐，裴回无所从。……苟无三月资，难适千里道”^{②⑫}，指的便是这种情况。

从谪居生活看，自然环境的恶劣直接威胁着人的健康，而“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②⑬}、“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大率皆无尔”^{②⑭}的生活条件更使人困苦不堪，至于“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②⑮}、“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②⑯}的低人一等的现实境遇，尤为沉重地折磨着他们的精神。所谓“瘴色满身治不尽，疮痕刮骨洗应难”^{②⑰}，绝非危言耸听。

从谪居时间看，短的数年，长的十数年，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张九龄、王昌龄、刘长卿、贾至、顾况、元稹、白居易等即属此类情况；有的时间更长，甚至终其一生都未离谪籍，如刘禹锡“二十三年弃置身”^{②⑱}，苏轼、黄庭坚、胡铨等皆一贬再贬，半生流落，而象屈原、贾谊、柳宗元、李德裕、王禹偁、寇准、秦观等，虽所谪时间长短不等，但均葬身贬所，无一生还。

地域的僻塞遥远，生活的艰难困苦和时间的缓慢久长，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困扰着贬谪士人的身心，而他们或以壮盛之年流落遐隅，将大有为之生命白白抛洒，或以花甲高龄南渡岭海，有去无还的人生遭际，更使其萌生出沉重的生命忧恐和生命悲叹。“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②⑲}“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③⑩}“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③⑪}……这一声

声悲凉沉重的叹喟,说明从贬谪那天起,贬谪士人的生命意识、死亡意识便急速萌生,而且愈到后来,便愈向生与死的临界点靠近。

5.这是真正的生命体验。进退出处的骤变,哀乐生死的无常,人生前景的飘忽,现实苦难的重压,无时无刻不在搅扰着众多贬谪士人的心境,从而不得不使他们的关注对象由社会转向自我,思想性格由外向变为内向。与此相应,搏取事功的抱负也日趋消减,取而代之,是将“全盛之气,注射语言”^⑳,开始了各类文学的专力创作。而在文学创作中,又主要抒写自我的人生遭际,心性情怀,以获取失调心理的暂时平衡,所谓“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故见乎词”^㉑,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清波杂志》有言:“放臣逐客一旦弃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是的,这里没有丝毫圆和平滑,有的是生命力与阻力的激烈碰撞;这里杜绝了一切无病呻吟,惟余沉重苦恼的心灵搏斗。一方面,“信而见疑,忠而被谤”^㉒的人生际遇使他们愤愤不平,忧怨两集,另一方面,“地虽厚兮不察,天虽高兮难谅”^㉓的现实又使他们一筹莫展,痛感失望;一方面,“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沱澜”^㉔的一片赤诚之心仍时刻骚动,就此作罢,实在于心不甘,另一方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㉕亘眼前,不断剥蚀着往日的信念,从而又只能屡兴无力回天之叹。有时,他们对往日的道德信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道家贵至柔,儒生何固穷?终始行一意,无乃过愚公!”^㉖有时,他们又完全陷入今昔对此所滋生的痛苦之中:“昨日三峰尉,今朝万里人”^㉗、“忆昨京华子,伤今边地囚!”^㉘飘忽即逝的年华,曾使他们痛心疾首,屡屡惊呼:“红颜与壮志,大息此流年!”^㉙而孤寂的处境、远离家园的万般悉苦,更使他们一次又一次生出浓郁至极化解不开的思乡情怀:“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㉚……

“颶风摇木,饥飏宵鸣,毒瘴横天,悲鸢昼落。心凭神理,实冀

生还；关号鬼门，常忧死别。”^{④③}这是何等索寞悲凉的处境和心境！正是这种处境和心境，使得无数贬谪士人或愤激哀呼，或凄怆涕下，甚而至于“嘻哭之怒，甚乎裂帛长歌之哀。过乎恸哭”^{④④}，在百感交集中而悲欢难言、哀乐莫辨。这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既是一支主题明确、意蕴深厚、充溢着真实生命痛苦骚动的文学乐章，又是一幅由血泪交织而成、饱含苦闷意识的中国贬谪士人的心态长卷。在这长卷的终结部分，我们分明看到了一种因正道直行横遭贬黜独处遐荒无可表白的屈辱感和悲愤感，一种因社会地位骤降为人歧视前途迷茫进退维谷的自悲感和孤独感，一种被整个社会和所属文化抛弃的恐惧感和失落感。

6、然而，这远非贬谪文学的全部内涵。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除此之外，部分贬谪士人还流露出两种颇不相同的强烈倾向，即执著意识和超越意识。正是这两种意识，构成了贬谪文学最富光彩的章节。所谓执著意识，盖指主体对道德人格理想的执著追求，对外来压抑和人世忧患的顽强抗争，换言之，贬谪士人虽身处逆境，饱经磨难，却仍然持守着昔日的信念，不为命运所屈服，在抗争中显示出一种伟大的人格和悲剧的力量。

屈原是最突出的代表。试读全部屈赋，不论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④⑤}的政治关注，还是“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④⑥}的志节表白；不论是对党人群小之“鄙固”、“庸态”^{④⑦}的揭露鞭挞，还是“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沈流”^{④⑧}的以死抗争，都充溢着坚定的执著意识，都指向一个永恒的目标。这是对黑暗现实的反抗，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是对命运的挑战，也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很难设想，在屈原那里，如果缺少了这种饱含悲剧精神、“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意识，那么屈赋的境界还能否象现在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

屈原之后一千年，贬谪士人中又站起了柳宗元、刘禹锡。虽然与屈原这位巨人相比，柳、刘的精神境界、情趣格调都要稍逊一筹，

甚至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时有消极悲观之念,但从整体上看,他们仍不愧身处逆境、勇于抗争的狷介之士,而且较之屈原,似乎更少了一点对君主的依附性,更多了一些刚健果敢的意向和自由生命的勃动。这只要看看柳、刘于贬谪前参加王叔文集团锐意革除弊政的激动心性,以及贬后对其理想信念始终不渝的态度,看看柳宗元《吊屈原文》、《笼鹰词》、《骂尸虫文》、《江雪》和刘禹锡《砥石赋》、《飞鸢操》、游玄都观二诗中所表现的志节情操、深广忧愤、斗争态度和生命情调,便可一目了然了。“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④、“受谴时方久,分忧政未成。比琼虽碌碌,于铁尚铮铮!”^⑤显而易见,执著意识一点上,柳、刘与屈原是一脉相承的。

所谓超越意识,乃指主体在历经磨难后承受忧患、理解忧患并最终超越忧患以获取自由人格的一种努力,也就是说,贬谪士人虽身处逆境,却能不为所累,超然物外,与世无争,在精神上达到一种无所挂碍的境界。

这种意识,在唐人白居易那里即明确展现,而后到了宋人苏轼、黄庭坚那里,则发展到了顶点。或许是由于唐、宋文化特质的差异,苏、黄和白氏的超越意识并不完全相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恐惧心理的对人生忧患的逃避,基于知足心理的与世无争和现世享乐,所以在他的诗文中最常出现这样一类词句:“倦鸟得茂树,涸鱼反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①、“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识命分,心慵少营为”^②、“莫入红尘去,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③而在苏、黄这里,则主要表现为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全面反思,对是非荣辱和狭隘小我的淡漠遗忘,对人世苦难的自觉承受并在承受中超越苦难,达到了一种高雅脱俗、物我同一的自由境界。正因为如此,所以山谷于“万死投荒,一身吊影”之后,不仅“已成铁石人心,亦无儿女之恋”^④,而且“已忘死生,于荣辱实无所择”。^⑤当“人以死吊”时,他淡然而笑:“四海昆弟,凡是日月星宿处,无不可寄此一梦者。”^⑥与

山谷相比,东坡居士的胸怀更其超旷洒脱。不是没有苦闷悲哀,在同时代人中,他的苦闷悲哀也许最为沉重:“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诗人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说的这几句意味深远的话,不正深深透露出他的苍凉心态及其人生遭际的个中信息了吗?但问题在于,东坡虽有苦闷悲哀,甚至屡屡生出对世事、人生的厌倦、怀疑,却始终不曾否定人生、抛弃人生。他或是以理遣情,自我宽解,或是将悲情沉潜于心灵深处,以对自然万物的透彻体悟,完成了“遇物而应,施则无穷”^⑤、随缘自适、游于物外的精神转变。“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⑥“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⑦“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⑧“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⑨身处逆境,而从容乐观,以坦荡之襟怀,傲视忧患,在困顿中寻求适意,在变动中把握永恒,在沉思中获得安宁,在淡泊中达到超然,以致所著诗文,皆“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⑩。这其中展现的,不正是一种澄澈圆融、丰厚阔大的思想境界和人格境界么?

7、不难看出,在上述贬谪士人的两种意识中,饱含着中国传统的儒、道两家思想的浓郁积淀。到了后来,由于又添加了佛家,尤其是禅宗的因子,就使得原有的思想纠葛更显得复杂化了。不过尽管复杂,其最终指归却只有两点,即执著与超越。儒家眷恋人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道家超脱人生,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佛教否定人生,以空无为标的;禅宗则倾向于以禅悦的形式游戏人生,获取当下的适意。对贬谪士人来说,这诸种人生态度大都兼而有之,只是因心性气质、学养经历不同而各有所偏重罢了。如柳宗元、刘禹锡大体宗儒,却又染指佛学;苏轼、黄庭坚后期更喜禅宗,但亦不乏儒者之人格光彩和心性情怀;至于白居易,则屡称自己“外服儒风,内宗梵行”^⑪、“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⑫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态,在一般情况下,这心态中的诸因素不易发生剧烈的冲突,但在特殊情况下,冲突便很难避免。由于贬谪

士人作为社会的弃儿,面对重重忧患,不得不一次次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调整固有的心理图式,这就势必引起内心深处诸种观念的搏斗,而搏斗的结果也只有两种,或偏重于经世致用的儒家式的执著,或偏重于逍遥洒脱的道、佛式的超越。

当然,这种执著和超越虽与儒、道、佛有关,却又有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和彻底出世的虚无主义,质言之,它更注重对自我情感之崇高性和超然的领悟追求,更注重一种精神上的安顿慰藉。在执著与超越之间,既有同一,又有区别。它们的同一,在于并不因为人生痛苦而否定人生,也并不因为对人生的眷恋而肯定痛苦,从而使得超越时即具执著,执著中亦寓超越。它们的区别,在于一个饱含悲剧情调,一个则要将此情调竭力淡化;一个着力在忧患中追求至真至善的道德化人格理想,一个则要在对忧患的承受和超越中追求艺术的自由人格理想。尽管就克服、消弭忧患而言,它们都具有某种虚幻性。

8、由于柳宗元、刘禹锡和苏轼、黄庭坚具有不尽相同的意识倾向,所以在其贬谪生涯和文学创作中,也就必然表现出彼此差异的人生态度和美学追求。

如果说,柳、刘的生命沉沦主要体现为一种因改革失败而耿耿于怀始终沉湎其中的政治悲剧,那么,到了苏、黄这里,便主要体现为一种因党争被贬而反思人生自觉退避社会的人生悲剧,以及对此悲剧的表层淡化和深层沉潜。也就是说,前者由于过多地执著于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的界域之内,因而不同程度地掩盖了对人生思考的深度,而后者则由于对社会政治的自觉退避,对道德人格的有意淡化,遂将视线的焦点落实在苦难人生以及对它的超越之上;前者的价值观仍与现实社会相联系,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人生的适意和真实生命的把握;前者的心理经常处于紧张、焦虑、冲突、苦闷之中,呈现出严重的内在失调,后者的心理则要轻松、宽和、淡泊、洒脱得多,维持了基本平衡。因而,在人生态度上,前者对命运